

書評

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1997·《地方社會》·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蔡明璋*

過去十幾年來，台灣社會科學更加強調本土研究取向，對在地社會的結構和過程進行嚴謹且貼近事實的觀察。因為「貼近」所涵蘊的「土味」，弔詭的，反而釋放令人興奮的氣息。

以本土研究為己任的學者，多少表現了「文以載道」的氣勢，也隱約散發出韋伯所說的魅力。本土研究的氣勢和魅力，不純然來自研究的主題，而是因為研究者能夠身歷其境，在最接近「地面」的地方，搜刮日常生活的經驗，建構出對事實的紮實理解。這些實踐是早期社會學研究比較欠缺的。而研究者使用的語言，也與日常生活用語儘量的調合，或者，抽象的概念建構也小心的源自常民的生活範疇，其他研究者使用這些概念很容易按圖索驥，還原到觀察對象及其行動上。這些研究一方面呈現了台灣社會的生活力，另一方面也鋪設了社會分析的新進路。

《地方社會》這本論文集是典型的本土研究的成果，在興盛的

* 中興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本土化潮流中，宣示另一種地方研究的方向。以地方社會的諸種行動者的表現作為探討對象的四篇論文，是本書的主體，另有兩篇所謂「一般性論文」，則是較為次要的。論文集的引導文章，是高承恕教授一篇回顧布勞岱與台灣中小企業的標竿論文。

高承恕是一個有說服力的社會學宣傳家。從布勞岱的歷史理論出發，他提出兩個重要的論點：（1）長期的「緩慢歷史」，以及建構這種歷史的日常生活實踐（一種微視的社會學），正是社會事實的結構與長期循環節奏的基礎。雖然布勞岱的長時期觀點也許可以詮釋為歷史與結構最終會佔有優勢的勢力；而行動者不時選擇、調整或更動，或許與歷史甚至是地理區位的緩慢變動，不免要產生緊張與衝突—使用馬克斯理論的研究者或許會轉而強調，歷史結構與行動之間的契合與否，常是變化多端的。（2）市場經濟的生產創造和累積活動，與資本主義的反市場、噬血性的壟斷支配的對照（p.13-14），就我而言，或許是太過強調了。資本主義採取市場經濟的確是後來的發展，採用或不採用市場制度，資本主義在不同的情境下常有迥異的選擇。最有意義的地方是將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網絡建構和運作，對照布勞岱的日常生活實踐觀點，同時指出這是市場經濟（“生意人”）的典範。令人深思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對這個群體的威脅和壓制，台灣中小企業面對龐然的歷史結構，多少有些無奈。這些觀察表現的豐富的社會學想像力是無庸置疑的。這篇文章燦爛的文采，攝人的魅力，足以激發本土化研究的參與者。但也正如副題所明示的，這篇文章是「個人筆記」，或許我在這裏太過正經的討論是不適合的。

論文集的四篇主體論文分別討論了：台灣地方派系的網絡性格（陳介玄）；一個紡織業城鎮的工廠關係（陳介英）；香港工業轉型中的調整策略（呂大樂，趙永佳）；以及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

的互動模式與困境（孫炳耀）。實際上這些論文對地方社會的關注程度頗有差異，前兩篇討論台灣的文章，顯然較符合這本書的主旨，在後面的兩篇論文中，是可以找到相關討論，但讀者必須很小心的搜尋，但以這種方式去閱讀，又容易使讀者分心。如果地方社會是指涉在中央國家與社群之下較小地域的社會團體，那麼這四篇論文的討論對象，是頗為不一致的。或許編者（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有另一種詮釋，能使讀者理解為何「地方社會」概念可以涵蓋這些文章，可惜論文集集中並未做任何說明。

地方派系的研究一向在國民黨的統合政治與待從支配的政治經濟架構下，討論國家資源與市場利益在地方的扭曲分配形式。陳介玄從社會學的角度指出，地方派系的基礎，更深沈的架設在樁腳網絡以及向下延伸的俗民網絡上，愈是在底層的網絡關係，象徵性的非經濟利益也就愈為重要（從血緣、地緣、人情的再凝結到 kimogi 的滿足）。選舉的動員需要派系由上而下的穩住這些關係（陳介玄的“再團體化”的概念），這需要具相當細緻的社會技藝（所謂的選舉細胞應包含這個主要成分）。陳介玄提供了一個相當有用的一般化概念，描述民間社會動態的基本特質—社會關係網絡的持續結構化。不過這篇論文在處理訪問資料，和詮釋資料的做法，並不是很圓滿。在引用受訪者的敘述，或研究者敘述一個故事時，常無法明確的呈現出主題，或者與鄰近上下文中所發展的論述有脫節的傾向，而使重要的論點顯得缺乏「直接的」證據（或者，讀者得辛苦的自己在文中找證據）。文後所附的參與觀察名錄未全用上，文中所指出的受訪者代號也不在名錄上，這方面的處理，也不是很理想。

陳介英對和美紡織業的研究所依循的思考路徑，也呼應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在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之間，技術水準的相似（缺乏相對的優勢）似乎形成一種結構性的機制，致使生產的利基

(niche)，不在市場需求的擴張，而是在既有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結果牽引了更多的製造業者投入競爭。在這個情況下，藉著投資在人際關係上而獲得足夠且穩定的市場配額，對企業的生存相當重要。在分析這種網絡關係的社會基礎時，陳介英認為這種生產組織聯結的模式是小農經濟社區的親族和朋友關係所支持的，同時，和美的區位結構所構築的密集居住形態（布勞岱的地理學？）幫助了人際關係互動密度的形成。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不限於和美紡織業），中小企業為何不能有效的累積、擴張？陳介英的解釋是傳統性的追求改善家計的心態（p.97），言外之意是生產的動機是提升消費水準（Weber的資本主義精神的反命題？）。但這個因果關係的邏輯並未很清楚的交待。這種習慣或許是一種「結果」，可以詮釋為生產創造力有限的組織，在利潤邊緣游走的困境下，所能採用的適應模式。對於想要在文中獲得較確定的解釋的讀者，是需要耐心去抓取穿梭在文中的論點再加以組合。

中小企業的轉型和調整並非不可能，但總是帶有困難。趙永佳、呂大樂分析香港成衣業和電子業指出不同的調整策略：在1980年之後，成衣業更扣緊市場需求的分化和變動，更密集的使用外包網絡，以增加生產彈性和分散市場風險。相對的，香港的電子業，和許多台灣一般中小企業相似，是以搬廠至低廉勞動力的中國（珠江三角洲）為主要策略。香港電子工廠的組織性格（加工組裝）是重要的因素，在壓低勞力成本的條件上，才能夠對世界市場的變化做靈活的反應。趙、呂描述了這兩種產業的應變策略的差異，並指出私有部門在不需政府支持之下（相對於國家中心論點），仍能有效的（但有限的）進行工業活動的調整。但這個結論點是有問題的，這種調整在技術創新和資本規模上是有限的、小規模的（相對於台灣的電子與半導體工業），因此反而肯定了他們想要反駁的國家論點（晚

來的工業化轉型與國家經常產生密切的關係)。但是這些討論與地方社會相關嗎?讀者或許會失望!論文中提及企業家的資金網絡,依賴親朋好友的傾向,這是最接近地方社會的描述了(p.125),但僅此而已。

孫炳耀對中國民間社會的討論,平鋪直敘的描述中國的民間次級團體在國家權力的限制,甚至是「依賴」的情境下的限制。這個論點並不是很有啟發性,同時理論概念的構築也闕如,並非是值得參考的文章。

綜合而言,如果讀者想要理解地方社會的相關理論,概念和經驗研究,這四篇主體論文提供的幫助並不是很完整。他們的貢獻需要從別的角度去評估(「企業研究」也許是一個較可用的但涵蓋度還是不足的標題)。

另外有兩篇「一般論文」與「地方社會」論文分開。首先是張維安與陳介玄討論台灣企業的三个重要研究者:(1)謝國雄的勞動過程;(2)謝國興的企業史,以及(3)高承恕與東海大學社會系的企業—生活—關係研究。最後一篇論文是韓格理與張維安對早期中國棉紡織工業的轉型歷史的討論。張、陳的論文對三位重要的經濟制度研究者提供了適時且有用的回顧,想要了解這些前瞻性研究的目前成果,這篇文章值得參考。但是,因為缺乏批判性的立場,使寫作者可以扮演的角色打了一些折扣。我期望至少提供更有效的對比,以突顯三者之間差異,在頁200上的表列有這種企圖,但實質上缺乏這項作用。第二篇論文是韓格理與張維安相當細緻的歷史分析,以十九世紀前中國的紡織活動作為起點,說明農村「既紡又織」的手工副業在西方工業的入侵和競爭之下的變化。在門戶開放之後的十幾年間,紡紗的活動在農村萎縮,但農村工業活動並未全盤的退卻,相反的,綿布紡織的活動更為盛行。促成「棄紡就織」

以及廣佈的散作制度的原因是，勞動力尚未從農村解放出來（特別是女性）。家庭農業生產的剩餘勞動力的存在，使現代工廠的制度相對而言是較不經濟的。文中亦討論了資本不足及市場需求擴增有限，亦為工廠制未能採行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國際資本和中國市場的暫時鬆動，提供了國內紡織機器大規模使用的契機。這似乎是一個依賴理論的結論，但兩位作者沒有考慮使用世界體系觀點加強理論解釋的張力，轉而強調內部社會結構的制度過程（農民的土地依賴、資本有限、市場擴張不足等）。

這本論文集各篇文章不乏有趣的啟發性意見，但作為一本論文，以「地方」作為標題，很容易誤導讀者：期望從這本書理解台灣的地方社會的企求恐怕會落空。或許應有一篇完整的導論，檢討至目前為止有關地方社會研究的成果。論文集最後附了顧忠華的書評（張維安的《文化與經濟：韋伯社會學研究》），是多餘的（已發表在中國社會學刊 18 期, 1995）。